

# “建安文字见于金石者寡矣!”一语道出这具东汉弩机的文物价值—— 23字铭文凝铸着建安风云往事

本报记者 郭 平

探新展 TAN XINZHAN

本溪市博物馆“文·物——中华传统文化教育展”中,一具东汉时期的弩机格外引人注目,弩机的机郭上铸有23字铭文,标定其制造于东汉献帝建安廿二年(217年)。此时,东汉王朝进入尾声,刘备、曹操、孙权之间征战不断,辽东在公孙康的治下获得短暂的休养……这些激荡的风云往事凝铸于这具弩机之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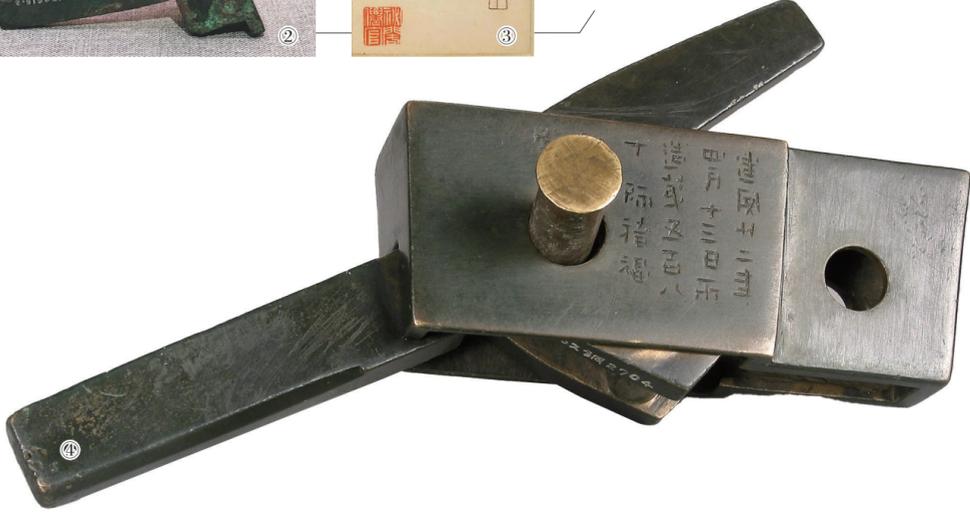
①《汉建安弩机》著录的一具汉代铜弩机拓片。  
②本溪市博物馆展出多具汉代铜弩机,这是其中的一具。  
③《汉建安弩机》著录的东汉弩机简图。  
④省博珍藏的建安弩机。其上刻有非常罕见的、极其珍贵的23字铭文:“建安廿二年四月十三日所造第五百八十,师稽福,郭工常。”

## 1 汉魏时期的铜弩机出土数量较多

本溪市博物馆“文·物——中华传统文化教育展”特别受欢迎。展厅中央布置4个玻璃展柜,参观者可以全面立体地欣赏展出的文物。其中有多款铜弩机,省博物馆藏“建安弩机”放在显著位置展出。  
省博物馆展览策划部副研究员温科学说:“省博藏的这具建安弩机不是出土文物,是1976年由沈阳市民捐赠的。”因此,人们目前还无法确定这件文物的具体出土地点以及1800多年来的流传经历。  
弩是在弓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说文解字》中有:“弩,弓有臂者。”弩的产生年代有多种说法,魏晋时期的史学家虞翻撰写的《古史考》中记载:“黄帝作弩。”不过他没有道出考证的依据。西汉礼学家戴圣编著的《礼记》中引述了《太甲》的记载,其中有

商代初年关于弩的描述。我国近现代著名历史学家唐兰认为,商代以前就已经有了弩,不过那时出现的是木弩。历史学家、复旦大学教授杨宽认为,青铜弩可能是在春秋时期才出现的,且应最先出现在楚国。  
无论弩是何时出现的,到了东汉至魏晋时期,弩的发展达到高峰,这一时期出土了数量颇多的铜弩机。  
弩机是弩的核心部件,东汉训诂学家刘熙《释名》卷七中的《释兵》记载:“弩,怒也,有势怒也。其柄曰臂,似人臂也;钩弦者曰牙,似齿牙也;牙外曰郭,为牙之规郭也;下曰悬刀,其形然也;含括之口曰机,言如机之巧也,亦言如门户枢机,开合有节也。”讲的是弩机是由望山、牙、悬刀(扳机)、钩心和销(键)以及装载这些零件的机郭等部分构成。

汉魏时期出土的铜弩机不仅数量较多,研究人员还在一些弩机上发现了铭文。这些铭文受到史学家格外重视,每有发现,人们就对其书法、文字内容以及制造机构等进行多方面研究考证。  
“建安弩机”是上世纪70年代进入公众视野的文物,因此相关研究成果很少有人提及。  
温科学介绍,这款弩机铜制,长10.65厘米,厚3.3厘米,缺一铜键,重870克,机郭上留有23字铭文:“建安廿二年四月十三日所造第五百八十,师稽福,郭工常。”  
“建安”为汉献帝刘协的最后一个年号,建安廿二年为公元217年,此时东汉政权已近尾声。这具铜弩机为人们留下了“建安”年间精确到日的详细记载。



## 3 铭文是建安时期战争与文化的缩影

2015年秋,西泠印社古籍专场拍卖中出现了一册《翁方纲、吴昌硕等题汉建安弩机拓本》,其中不仅有东汉建安弩机的全形拓片,还有清代书法家、金石学家翁方纲题写的《东汉建安弩机歌》,其中有“程福福福二师氏,土花并起卫星变”,诗句说的是师稽福、师稽福两位师姓人,在历史云烟中守护着珍贵的建安文字。翁方纲进一步解释说,他确认“师稽福”是一个人名,很可能就是铭文的书写者。他随后感叹:“此外建安年文字见于金石者寡矣!”意思是说,除此之外,建安年间的字迹见于金石上的太少啦!  
再结合“建安七子”对后世的文学影响,可以看出“建安”二字在中国历史上的分量。  
然而,建安廿二年,东汉王朝已经步入尾声,被人熟知的便是“三国演义”,此时,刘备已经占领了益州(今四川一带),这一年,他采纳了法正的建议,兴兵争夺汉中。  
这年正月,曹操统兵进驻居巢(今安徽桐城),孙权则进军到濡须。两军在二月间交战,战事僵持到三月,曹操领军回许昌,留伏波将军夏

侯惇,都督曹仁、张辽等二十六军屯居巢。随后,曹操、孙权罢兵修好。  
当时曹操正在谋划夺权的大事。《三国志》载:“夏四月,天子命王(曹操)设天子旌旗,出入称警蹕。五月,作泮宫。六月,以军师华歆为御史大夫。冬十月,天子命王(曹操)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车,驾六马,设五时副车,以五官中郎将丕为魏太子。”在这一年里,曹操逼迫汉献帝允许他以天子的仪仗,冠冕出行,并且为自己确定了接班人。  
历史上曹操多次发布诏令选拔人才。建安廿二年八月,曹操再一次发布了《举贤勿拘品行令》,命部下推举人才,凡有一技之长,不拘品行,皆可推举。这是曹操第三次以命令的形式推行“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  
而此时的辽东仍在公孙氏治下,获得短暂的休养。建安廿二年,辽东的实际统治者公孙度的长子公孙康、公孙康子承父业,史册中留墨不多,在其统治期间发生两件大事。  
建安十二年(207年),曹操亲征乌桓。八月,在白狼山之战中大破乌桓及袁尚。袁尚、袁熙兄弟与辽东单

于速仆丸带领数千骑兵投奔公孙康。有人劝曹操乘势追击,曹操说:“我如果不出兵,公孙康会送来袁尚、袁熙的人头,不必再劳师动众。”便从柳城班师。袁尚逃到辽东后,便同袁熙商量欲杀公孙康,占领辽东。没想到,公孙康抢先下手,捉住了袁尚、袁熙。于是,袁尚、袁熙连同速仆丸一并被杀,人头送给曹操。曹操封公孙康为襄平侯,授任他为左将军。  
另一件事发生在建安十四年(209年),公孙康出兵进攻辽东割据部族,攻破其都城,焚烧邑落,至此辽东边患得到平息。  
辽东此时相对于战乱不断的中原地区有着少有的和平环境,吸引了不少知识分子到这里避乱,客观上也推动了辽东地区文化事业的发展。  
“建安”两字以铭文的形式留在战争工具上,进一步反映了那个时期战争与文化生态的真正历史面貌。



更多精彩 扫码观看

## 2 发现同日造的另一具汉代弩机

在此次展览中,建安弩机并不是一件孤立的展品,而是整个展览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展览的第一单元以三堂课的形式,结合成语以及古代诗词,讲述文物中所蕴含的历史文化。建安弩机是第三课《长戈利矛日可麾》篇目中的重点文物。  
结合成语“剑拔弩张、强弩之末”,宋太宗赵光义《绿识》中的诗句“壮士屈臂凤凰飞,张弓发箭胜于弩”,策展人通过展板、图片和实物,具体而生动地介绍了我国古代威力很大的远射兵器——弩,同时展出了几具汉代的弩机,让人们感觉到东汉末年千军万马战场厮杀的震撼。“建安弩机”铸有铭文的一侧朝向展厅入口,意在凸显铭文隶书的独特价值。  
温科学提醒记者注意“建安廿二年四月十三日”,这个时间与清代学者吴云编著的《汉建安弩机》中著录

的一具东汉弩机制造的时间完全相同。这具弩机上有19字铭文:“建安廿二年四月十三日所制八千五百,师稽福。”两者不仅时间相同,而且都出现了“师稽福”三个字,表明历史上这两具弩机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  
记者了解到,吴云编著的《汉建安弩机》书中著录的东汉弩机是擅长金石考据的清代官员宋葆淳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于京师得到的。嘉庆七年(1802年),宋葆淳将其转给清代金石学家、书法家张廷济。张廷济以其藏书闻名一时,他所著的《清仪阁所藏古器物文》一书中,不仅收录了这具弩机的拓本,还对其形制、流传、收藏情况作了记录,最重要的是,他对弩机的铭文作了考证。  
然而,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位于浙江嘉兴的清仪阁毁于战火,这具弩机流落民间。随后它被清代官员吴

云之子吴承澂购得。吴云收集了弩机的外形图,各家摹本,诸藏家对此弩机的研究论述,加上个人见解,汇编成《汉建安弩机》,并在光绪六年(1880年)刊刻。此后这具弩机经徐仓粟、张牟群等人收藏后,不知去向。  
温科学说:“在我国历史上,东汉末年的建安时期很特殊,使‘建安’名垂千古的是其文学成就。”  
建安时期最为人们熟知的便是“建安七子”,这一提法始于魏文帝曹丕所著的《典论·论文》一文,说的是东汉建安年间的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7人以文学齐名,得到后世广泛认同。此后,建安七子与“三曹”(即曹操、曹丕、曹植)被视为汉末三国时期文学成就的代表,他们创作的具有慷慨悲凉、雄健深沉特征的诗、赋、散文作品,被后世赞为“建安风骨”。

# 刘贤墓志:见证墓志演变进程的标志性实物

本报记者 朱忠鹤 文并摄

## 刘贤墓志与墓碑相似

1965年,朝阳地区发现了一座北魏时期的砖室墓。该墓已被盗挖一空,仅留下一块石碑。考古人员根据石碑内容,确认墓主人是北魏时期一位官职较小的官员,他的名字叫刘贤。  
考古工作者进一步研究发现,这块石碑十分珍贵——它丰富了北魏早期我省朝阳地区的历史、拓展了后世对北魏早期书法的认识。最重要的是,这块外形似墓碑,却标注为“墓志”的石碑,在我国墓碑发展历史上具有过渡性的标记意义。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58年前刘贤墓被发现时,墓内仅存一具腐烂的木质棺槨和一座倒在地上的石碑。幸运的是,石碑保存完好,它的底座,也就是“墓座”同样保存完好。目前,整座石碑已被辽宁省博物馆收藏。  
石碑全高1.03米,碑身宽30.4厘米,厚12厘米,石碑顶部刻有“刘戌主之墓志”。这6个字介于篆书、隶书之间。正是通过这6个字,考古工作者认定这块外形像墓碑的石碑应该是墓志。  
与一般墓碑不同,刘贤墓志的四面都刻有文字,一共194个字,这些字均为隶书,勾勒出墓主人刘贤的生平。  
刘贤的官职是北魏时期营州(今朝阳)临泉戌主,是一位下级地方官吏,64岁去世。综合墓志文字,考古人员推断,刘贤很可能在北魏文帝拓跋焘在位时期(公元452年至465年)去世。  
墓志开头有“君讳贤”三个字,再加之墓志右刻有“君息僧洸,州西曹;息多兴,进士,都督;息武兴,息康仁。孙高和,孙德素,孙法爱”等名字,辽宁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么乃亮说,这些文字表明,刘贤墓志是由其子刻立的。  
刘贤的长子叫僧洸,曾任“州西曹”

一职。“州西曹”即是“州府西曹书佐”的简称,是当时主管起草和撰写文书的小官吏。因为这一官职上的官吏大多能文能书,有考古工作者推断,刘贤墓志的内容和书法很可能出自僧洸之手。  
刘贤极有可能是鲜卑族人  
虽然刘贤姓“刘”,但历史与考古学家分析,刘贤极有可能是鲜卑族人,或者是有着鲜卑血统的其他部族人。  
碑文中写道,刘贤“字洛侯”。实际上,在北魏时代,以“洛侯”为字的人并不少,而且都是鲜卑族,且时代比较早。也就是说,在北魏早期,不少鲜卑族人的名字都愿意以“洛侯”为字。从这一点上,也印证了刘贤是鲜卑族人。  
墓志中还写了刘贤的籍贯是“朔方人也”。“朔方”是个地名,汉代时就有,大体范围包括今天的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阴山山脉以南,河套北部、东部、陕西北部、宁夏北部和山西汾河以西的一部分地区。这样看来,刘贤的生活与工作地点距离籍贯十分遥远。墓志碑中记载了刘贤来到辽西的原因:被迁移至此。  
历史文献记载,北魏灭掉大夏后,前后两次俘虏和徙徙人口:第一次迁徙到了平城,第二次没有明确记载,但刘贤墓志写到“散人燕齐”,很可能是从籍贯地被徙到辽西地区戍边的。  
墓志中记载,刘贤先是在冀州做“郡中正”,这是一个乡官。后来被任命为“临泉戌主”。  
考古学家曹汛认为,刘贤任营州临泉戌主一职是在北魏前期,又在北边边塞地区。当时,这个官职的地位并不高,刘贤自“郡中正”改“戌主”,可能也只有八九品,管理巡逻戍边的士兵三五十人。

## 墓碑与墓志有明显的区别

刘贤墓志碑之所以入选《第一批古代名碑名刻文物名录》,主要原因是因为它是墓碑形式的“墓志”。  
曹汛曾经指出,在北魏出土的墓志中,像刘贤墓志这样有螭首、下有螭座,完全是地面上隆重大墓碑的形制,还是首次发现。不仅如此,这种外形是墓碑,但却写着“墓志”字样的碑,目前也仅此一例。  
么乃亮表示,梳理中国墓碑、墓志的演变脉络可知,中国最早的“碑”起源于春秋时期。那时候的碑主要分为三种形式,一种立于官门前,类似于“日晷”的作用,一种是宗庙院内拴祭牲牲畜的石柱,还有一种就是墓碑。  
那么,墓碑和墓志有什么区别呢?  
么乃亮说,一般来说,墓碑竖立于坟墓前或后,以表彰死者,又称墓表。如果竖在墓道上,称为神道碑或神道表。墓碑一般刻有死者姓名、生平等等文字,起源于古代死者下葬时用来牵引棺槨的丰碑。  
碑刻的出现,始于东汉初年。由于东汉时期豪强大族,官家勋贵重视上家礼俗,讲究坟墓建筑,再加上当时炼钢技术的进步,坚利的钢铁工具便于开凿和雕刻石材,于是,他们在建造石祠、石阙、石柱的同时,也流行以坚固的石碑代替从前易朽的木制墓碑。到了魏晋时期,朝廷禁止在墓前竖立碑阙。至此,东汉时期盛极一时的竖立墓碑风气被取消。至南北朝时期,刻立墓碑风气又重新兴起。隋唐以后,墓前竖碑之风大盛。不仅如此,此时墓中还多埋有一块与墓碑内容相同的墓志,形成地面地下互相对应,而且,这种形制成为唐代以后墓葬的主要形式。  
墓志是随棺槨一起埋葬的碑,一般

为方形石质或砖质,有盖顶盖,通常平置于墓内的墓室门前、墓主头前或甬道中。  
墓志文体繁简不一,字数由数十个字至数千字不等,内容与墓碑相同。  
关于墓志的起源,学术界尚有争论。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赵超所著的《墓志溯源》中记载,墓志在南北朝时期基本定型,其形制受到墓碑、墓碑等器物的影响。其内容、文体则吸收了铭、墓志铭、墓阙铭、神道、墓碑、墓门等各种刻铭的表现形式,不断变化充实发展。埋没的的也与墓碑铭、墓志、神道、墓碑等完全一致。因此,墓志的起源可追溯到西汉早期。  
魏晋时期是墓志发展的第二阶段,这一时期,盛行一时的墓碑由于被严厉禁止而从地面转入地下,与坟中的铭刻器物汇合,形成形制较小的石质墓志。这一转化在文体上、刻制工艺上都给墓志的发展以极大影响,推进并促成了墓志定型化。  
南北朝时期是墓志发展的第三阶段。这一时期,墓志的名称已正式出现,形制和文体都已相对稳定成型。其内容一般包括三个方面:对死者姓名、籍贯、生卒年月、官职、谱系的叙述,对死者生平事迹、才能品行的记述和颂赞,用“铭”的韵文来表达哀悼。此后,墓志大行于世,并且延续了1000多年。  
么乃亮表示,墓碑与墓志的功用基本一致,但又有明显区别:其一,建立的方式不同。碑立于墓前地面上,与世人共观,重在炫其德业;墓志埋于地下,为防陵谷变迁,而追求永久。其二,形制不同。墓碑常有碑额和碑阴题名,墓志有墓盖,部分墓志有首题。其三,材料不同。墓碑多用石头制成,墓志则以石头为主,也有少量砖质。其四,内容大体相近而有侧重。墓志内容更详细,而墓碑以叙事赞颂为主。



刘贤墓志的正面和侧面。墓志整体呈墓碑形状,四面刻有文字,其文字介于篆隶之间,被认为是墓志演变进程中的关键一环。